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艾滋病与社会

预防艾滋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作者: 潘绥铭 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3期 类别: 艾滋病与社会 日期: 2005.02.23 今日/总浏览: 1/816

预防艾滋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潘绥铭

有利于招商引资

我们的一些同志常常害怕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之后,等于宣布这里的艾滋病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外商可能会不敢来投资。这其实是对外商的不了解。

在欧洲和美国,“艾滋病时代”已经至少持续了15年,预防艾滋病的社会运动已经开展了至少15年;几乎人人都具有预防艾滋病的正确知识,几乎没有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对艾滋病产生恐惧。尤其是欧美社会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可怕的并不是艾滋病,而是不预防。

相反,中国的艾滋病发展势头很猛,这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欧美商人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我们的领导者是不是已经开始预防了。如果他们来到我们的某个地方,知道了(甚至是自己直接看到了)吸毒、卖淫或者血液管理的混乱,可是却看不到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在开展,甚至我们还信誓旦旦对他们保密,他们反而会更加担心的。这就像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明明知道某地的假冒伪劣产品很多,却看不到当地政府的严格治理,那么我们还会在当地购物吗?

至于日本和韩国的外商,虽然他们本国的艾滋病很少,但是他们的预防工作开展得却一点也不逊色于欧美。尤其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和投资之前的情况调查,细致和深入得往往令我们自己都汗颜。面对这样精明的外商,我们如果还保密,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这里明明存在着艾滋病传播的可能性(无论是大还是小),我们却迟迟没有开展预防工作,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向外商证明我们是一个负责任和有效率的政府呢?他们怎么会相信我们仅仅只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稍有欠缺呢?我们现在都深刻地理解了“软环境”的重要性,可是还有什么比当地政府自己的形象更重要呢?

有利于预防和化解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艾滋病在整个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毫无疑问是要增加的，问题仅仅在于增加的速度有多快。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同时，我们也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有可能传播艾滋病的四种主要活动（吸毒、嫖娼、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哪一种都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至少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是这样。

因此，如果不马上就开始预防，我们迟早都会遇到这样一个社会矛盾：艾滋病的任何增加，哪怕很少，都会被归咎为当地政府的失职。这是因为，禁毒、禁娼、保证血液安全和保障母婴健康，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当地政府的无可推卸的直接责任。结果，本来只是传染病之一的艾滋病，本来只要预防就可以基本解决的一个并不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就非常有可能在艾滋病不可避免地增加之后，突然地甚至是完全地被“政治化”甚至“冲突化”。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艾滋病虽然现在主要是传播于各种“边缘群体”当中，但是一旦它的基数（被感染者的总数）突破了临界点，它就会无可挽回地在中间阶层中、在主流社会中，乃至在社会主导群体中大肆传播。那时，这些新的被感染者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政治能力乃至道义感召力都会空前地巨大，足以形成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是社会冲突。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间阶层、主流社会和主导群体恰恰又是最理智、最务实的。因此，他们不但是最受欢迎和最容易接受预防艾滋病工作因而风险最小的人群，而且是最可能理解艾滋病必然增加这一规律的人群。只要我们真的尽力预防了，那么在将来面对艾滋病增加的局面时，这些人群就会最积极地肯定我们的工作，会最有力地反对任何极端思潮，从而成为预防或者抑制社会危机的最主要力量和政府的最可靠支柱。

史有先例：1990年代之初，当艾滋病开始在欧美的“中产阶级”里加快传播的时候，曾经有一些社会力量试图把它转化为政治问题，而且非常巧妙和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社会不满情绪。但是短短几年之内，恰恰是中产阶级发起了强大的“团结运动”（“面对艾滋病，我们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互相指责”）。它一方面成功地抑制了那些极端倾向，另一方面又在给政府的预防工作提供强有力支持的基础之上，成功地把原来的政府行为扩展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结果是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全赢”的局面：艾滋病的增幅急剧下降、政府的相对支出减少、感染者这个过去的“边缘群体”受到关爱、全社会的凝聚力增强等等。因此有的美国人说：在这场战争中，除了艾滋病，没有一个人不是获胜者。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社会的团结一致。因此，无论当地的艾滋病是多还是少，我们现在就开始预防，无疑会增强当地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抗灾害”能力，无疑会为伟大复兴避免和排除艾滋病这个无谓的干扰。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看，这也无疑是一种正确的、值得高度赞赏的政治行为。

有利于领导班子本身的务实与开拓进取

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不仅需要多部门和多方面的积极参与，而且特别需要作为主导者的当地领导班子去务实与开拓。

预防艾滋病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减少“传染源”。可是勿庸讳忌的是：至少在禁毒与禁娼这两个方面，我们以往的办法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一般情况下，领导班子很容易把这仅仅看作是一个治安方面的问题，仅仅从治安管理的角度来探索解决之道。可是现在艾滋病来了，它迫使我们不得不开阔眼界，不得不从“对公民的生命负责”这样一个充分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高度，从避免和排除对伟大复兴的任何干扰这样一个历史角度，来重新认识禁毒与禁娼的问题。

在西南的某个县级市，为了预防艾滋病，必须随时掌握娱乐场所中的服务者与消费者的流动情况。这，靠以往的工作方式已经远远不够了。当地领导班子并没有等政策，更没有限于空谈，而是成功地在多达数百个娱乐场所的服务者中间，建设起一个可持续的网络，既能够反映情况，又能够进行初级的预防艾滋病宣传。同时，禁娼的工作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南另外一个省的某县，也是为了预防艾滋病，在娱乐场所的经营者中建设起了更加组织化的网络，而且充分发挥了党员的积极作用和职能部门的领导作用。结果，那里的禁娼工作反而开展得比过去更好，因为恰恰是这些被组织起来的经营者们自己而不是公安部门，一举根除了曾经肆虐得远近闻名的诱骗与强制行为。

当然，他们一开始也没有这么自觉。前面所说的那个县级市，是因为靠近毒品流经地，禁毒的压力格外大，才痛下决心，而且一开始是被当作“下策”来使用的。另外那个县则是因为闹出了“女服务员跳楼事件”，被最高层责令严查，才去努力争取长治久安的。可是最重要的是，两个地方的领导班子都没有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低水平上，而是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总结完善，结果终于实现了“一枝多花”：两地不仅反击了艾滋病的挑战，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例如经济环境的好转、社会的理性化等等。

如果说这两个例子多少有些“歪打正着”的话，那么在全国的4个县级地方，娱乐场所中的“100%使用安全套”的项目已经开展一年，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对于那些或者空谈误国或者因循守旧的人们来说，即使是上级批准的国际合作项目，恐怕也不愿意在自己那里首先开展的。

因此可以说：上述这些开展预防工作的地方的领导班子，是在真正脚踏实地积极做事，是身处一隅却眼观世界与历史，具备了新时代应有的政治觉悟与领导能力。

也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预防艾滋病这样一个既具有挑战性其实又不那么敏感的工作，当作我们为伟大复兴进行的一次练兵，当作提高领导班子水平的一次机会。尤其是，越是对预防艾滋病心存抵触的地方，恰恰越应该这样尝试一下。否则，连这样利国利民利己的事情都不敢做或者不屑做，那么党和人民还能指望他们些什么呢？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